

论“一带一路”的社会历史条件

刘玉安 赵 岩

摘 要:在逆全球化趋势显著的背景下,我国提出和倡导的“一带一路”发展规划和愿景,引起了举世的瞩目,而且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功。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因为我国的“一带一路”同时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这三大条件。

关键词:“一带一路” 能源互联网 社会历史条件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2338(2018)01-0053-05

作者简介:刘玉安,男,博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政治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全球能源互联网(山东)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赵岩,男,博士,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DOI:10.14154/j.cnki.qss.2018.01.008

从 2013 年 9 月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提出到 2017 年 5 月 14 日北京峰会的召开,“一带一路”工程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已经有一百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响应和支持,目前已经有 40 多个国家与我国政府正式签订了 70 多份协议,还有更多的项目和协议已经进入了酝酿、谈判之中。“一带一路”为什么有如此之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为什么能取得如此之大的成功?

中国古代思想家孟子就曾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1]。著名军事家孙子更进一步指出: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2]。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国,要办成一件大的事业,必须同时具备三大条件,即天时、地利和人和。“一带一路”之所以具有如此之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并能够顺利推进,正是因为它具备了这三个条件。

一、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机遇

众所周知,自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一直处于低迷状态。作为世界经济最大板块的欧盟(包括英国在内),其 2008-2016 年的经济增长率还不到 1%;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美国,经济发展势头虽然已经有所好转,但自 2008 年以来的经济增长率也不到 2%;而多年来一直充当着世界经济发展引擎、同时也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其经济增长速度也明显放缓,从 2007 年的 14.16% 降低到 2015 年的 6.9% 和 2016 年的 6.8%。在此期间,无论是在欧盟、美国还是在我国,都出现了明显的传统产业的产能过剩现象。产能过剩意味着生产供应大于消费需求,需要更多的市场。但是,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为了保护本国市场,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美国的特朗普政府一上台就宣布退出 TPP,并且提出要重新评价“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甚至还要退出 WTO。英国脱欧已经成为事实。世界贸易总额和占世界 GDP 的比重这两个数值都在明显下降。2014 年,

基金项目:国家电网科技项目“全球能源互联网构建中宏观战略关键问题研究”(SGSDDK00KJJS1600067)。

全世界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为 38 万亿美元, 占世界 GDP 的大约 49%; 2015 年, 世界贸易总额下降为 32 万亿美元, 仅占世界 GDP 的 42%; 2016 年世界经济虽然有所复苏, 但世界贸易总额却下降为 31.25 万亿美元, 占世界 GDP 的比重也下降了将近一个百分点。^[3]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非常可怕的趋势。因为贸易保护主义是经济发展的陷阱, 是一条死路, 其结果是不会有赢家, 而是“共输”。用法国新任总统马克龙在其竞选中的一句话来说就是: 在全球化时代, 把法国孤立于世界之外是不可能的, 一秒钟都不行! 整个世界经济也是如此。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政治家都已经认识到: 世界正在陷入贸易保护主义的陷阱。但怎样才能摆脱它呢? 在这种背景下, 中国的“一带一路”规划应运而生, 适时破解了贸易保护主义给全球经济带来的困境。

不过, 从全球的范围来看, 产能过剩是相对的。虽然欧盟、美国甚至包括我国, 出现了明显的、严重的产能过剩, 极需要开拓市场, 但另一方面, 世界上众多发展中国家却急需建设、发展, 而又苦于本国产业能力无法满足发展需求。最近几年, 世界 GDP 一直保持在 70 多万亿美元的水平, 世界总人口则为 73 亿左右。全世界人均 GDP 为 10000 美元左右。但是, 世界 GDP 的实际分布却极不均衡。到 2016 年, 最富有的卡塔尔、卢森堡、瑞士和挪威, 其人均 GDP 超过了 8 万美元; 世界上最大经济体的美国, 其人均 GDP 也达到了近 6 万美元; 欧盟国家人均 GDP 为 4 万美元; 我国人均 GDP 约为 8500 美元。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例如缅甸、孟加拉国、巴基斯坦、老挝、柬埔寨、印度等等, 其人均 GDP 目前不足 2000 美元, 而阿富汗、尼泊尔等欠发达国家人均 GDP 还不到 1000 美元。如果说发达国家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产能过剩、经济增长疲软的话, 那么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面临的主要问题则是生产能力严重不足。用一个简明的指标来描述: 在这个占世界总人口将近三分之一的不发达地区, 其人均用电量还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

事实上, 到目前为止, 这些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完成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型。在它们的国民经济体系中, 第一产业还占据着相当大的比重。有些国家虽然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 但由于基础设施落后而无法开采、利用。而要改善基础设施就必须有大量的投资, 用西方国家当年走过的路来说就是需要有一笔“原始积累”。而在目前的世界经济结构中, 由于大国贸易主义势力的抬头, 这些国家几乎没有办法得到这笔“原始积累”。

也就是说, 从世界经济的总体来看, 一方面, 发达国家和包括我国在内的一些新兴经济体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 急需新的市场; 而另一方面, 以印度、巴基斯坦、中亚国家等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急需改善基础设施, 急需投资。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发展倡议使目前世界经济发展中产能严重过剩和急需外来投资的双方看到了合作的前景。基于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能差异、经济互补性强而带来的双方产业合作的巨大潜力, 适时地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产能输出或投资基础设施建设, 为双方的合作搭起了一座桥梁, 构建了一个互利共赢的局面。一方面, 这种合作为正处于产业转型升级中的我国经济带来了新机遇; 另一方面, 这种合作也将为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所需提供资金或技术, 助力沿线国家的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等经济社会建设。^[4]在“一带一路”的框架内, 由国家电网公司主导的“全球能源互联网”项目选定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能源互联网建设作为整个项目的桥头堡工程, 就是看到了中国与中亚国家在电力能源开发、电力输送和利用等方面的先天条件和产业合作红利。因此, “一带一路”倡议勇于扭转逆全球化的潮流, 或者说是顺应了历史的潮流。这就是为什么“一带一路”倡议一经提出, 立即得到全世界的瞩目和积极响应的最重要原因。

二、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地缘条件

众所周知, 所谓的“一带一路”与中国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有着密切的联系, 以至于国外有许多媒体就把它翻译成“新丝绸之路”。但是, 正如马克·吐温所指出的: 历史是不可重复的。绝大多数历史事件都一去不复返了, 为什么“丝绸之路”却有了第二次生命? 这得益于它特殊的地利条件。

闻名遐迩的“丝绸之路”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1 世纪汉武帝时期。为了寻求贸易合作与文化交流, 早在公元前 138 年, 汉武帝就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即现在的中亚、土耳其、意大利等国, 并且建立

起来一条链接亚、欧、非三大洲的贸易通道。由于“丝绸”是当时贸易的最主要的货物，这条通道也因此而被称之为“丝绸之路”。这也是有历史记载的中国政府寻求对外交流合作的最早尝试。

后来，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中国又开始了从海路发展对外交流与合作的尝试。从15世纪初开始，明太祖朱棣派遣郑和，率庞大的船队先后七次穿越太平洋、印度洋，先后到达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索马里等30多个国家。郑和的远航不仅促进了中国与这些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而且还使得中国在世界上的名声大振：郑和的远航毕竟比哥伦布早了将近一个世纪。中国的造船及航海技术在当时毫无疑问地遥遥领先于全世界。中国被一些西方冒险家描述为遍地是黄金的国度。这引起了西欧新兴资产阶级冒险家的强烈向往。越来越多的欧洲探险家、商人、传教士开始了他们的东方之旅。1492年，哥伦布带着西班牙国王致中国皇帝和印度统治者的国书，开始了他的远航。也就是说，哥伦布是在他去中国的途中，意外地发现了美洲这块新大陆。

然而，这一发现却改变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轨迹：人类第一次对于我们生存其上的这个星球有了一个全面的、系统的了解，这个星球上的五大洲、四大洋之间开始有了实质性的联系，穿越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的全球贸易航线建立起来了，世界市场开始形成。

按照著名英国历史学家彼得·弗兰科潘的观点，所谓的丝绸之路，绝不仅仅是一条贸易之路。在某种意义上说，所谓的丝绸之路实际上就是整个人类文明传播之旅。他把其最近刚刚推出的新作《丝绸之路》就加上了这样一个副标题：一部全新的世界史。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两千年来，丝绸之路始终主宰着人类文明的进程。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帝王、军队、商人、学者、僧侣、奴隶，往来在这条道路上，创造并传递着财富、智慧、宗教、艺术、战争、疾病和灾难。”“丝绸之路让中国的丝绸和文明风靡全球；罗马和波斯在路边缔造了各自的帝国；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沿着丝绸之路迅速崛起并传遍整个世界；成吉思汗的铁蹄一路向西，在带来杀戮的同时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融；大英帝国通过搜刮丝绸之路上的财富，铸就了日不落辉煌；希特勒为了这条路上的资源，将世界推入了战争和屠杀的深渊。时至今日，丝绸之路上的恐怖主义，依然是美国争霸道路上挥之不去的梦魇。”^[5]也就是说，在弗兰科潘看来，丝绸之路本来就是人类文明发展史的浓缩。如果把整个人类文明比作一部没有结尾的连续剧的话，那么，丝绸之路就是这部连续剧最耀眼的舞台。这个舞台上的剧情可以有跌宕起伏，但不会曲终人散。

虽然我们未必完全同意弗兰科潘的观点，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无法否认的：目前，世界上60%以上的人口仍然生活在丝绸之路沿线区域，这里不仅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而且它目前还储存着丰富的自然资源。这两点就锁定了丝绸之路作为人类文明舞台的中心地位。

当然，舞台的中心永远属于舞者。无论是在汉代还是在明代，中国都是世界经济中无可争议的最大经济体，并且扮演着世界经济发展引领者的角色。只是到了近代，中国才逐渐落伍了。当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如火如荼地发展之时，清朝的统治者却如夜郎自大般推行了闭关锁国的政策。这使得中国由世界经济发展引领者逐步蜕变为被动的跟随者，使得曾经的位居世界第一强国的泱泱帝国，沦为任由西方列强欺凌、宰割、肢解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被惨痛地视为“东亚病夫”。

后来的剧情虽然有了反转，但是直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并没有摆脱贫困、落后的局面。到1978年，占世界人口将近四分之一的中国，GDP只有2683亿美元，仅占世界GDP的1.8%，排名世界第15位，人均GDP只有155美元，在纳入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统计的137个经济体中排名倒数第3位，仅高于尼泊尔和索马里。中国自身实力的羸弱，直接导致了整个丝绸之路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戏份的悄然减少。

然而，改革开放使中国焕发了新的活力。经过30多年持续高速发展，到2016年，我国的GDP已经达到了11万亿美元，在世界GDP中的比重上升为15%，排名仅次于美国。人均GDP已经达到了8865美元，在181个经济体中上升到了第69位。中国的快速发展不仅使自己摘掉了贫困落后的帽子，而且还带动了整个世界经济、特别是“一带一路”地区经济的发展，这种传统丝绸之路奠定的良好交流根基和原本就有的地理亲缘性，再加上双方之间现阶段显现出的经济互补

性,使得“一带一路”倡议一经提出,就得到周边国家的积极响应。中国重归世界经济发展引领者的行列,使得古老的丝绸之路也焕发了新的活力,使得它再次成为人类文明最耀眼的舞台,这也是“一带一路”倡议地利优势的集中体现。

三、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社会条件

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任何伟大的、持久的事业都必然有深厚的社会基础,都必然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的动力,那末应当注意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民众、使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6]也就是说,顺应民意、获得广大民众的支持,是任何伟大历史事业成功的最重要的前提。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中国,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而我国的“一带一路”工程,则不仅顺应了天时,占据了地利,而且还聚集了最重要的人和。

弗兰科潘在他的《新丝绸之路》中,对已经达成和正在规划、谈判中的项目做了一个整体描述。^[7]正如弗兰科潘所发现的,在这条所谓的新丝绸之路,几乎一点点丝绸的味道都没有。目前已经签署和正在谈判的项目都集中在铁路和输油、输气管道建设上。所谓的丝绸之路实际上正在演变成成为“能源之路”。

“能源”之所以取代了“丝绸”而成为新丝绸之路上的主角,显然是因为,随着近代工业、农业技术的发展,丝绸在人们的国计民生中所占的地位已经变得微不足道。正是因为缺失了民众的支持,曾经盛行一时的丝绸之路却几乎无声无息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然而,能源则不同。能源是整个现代社会生活之源。它不仅事关一个民族的兴旺发达与战略安全,而且还与每一位黎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然而,只要浏览一下世界地图就会发现,在这个地球上,特别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能源的分布极端不均衡。有些国家和地区,例如俄罗斯、海湾地区和哈萨克斯坦等,蕴藏着大量的石油、煤炭、天然气等;有些国家和地区能源极度匮乏,几乎完全依赖进口;有些国家虽然能源匮乏,却富有其他资源。此外,尽管能源非常重要,但却不是一切。即使那些能源极其丰富的国家,至少需要把能源开采出来并且找到买家,才能得到他们所需要的其他物品。这或许是上帝的精心安排:在这个地球上,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地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凭一己之力来解决能源的开采、运输和利用问题,能够自己关起门来过日子。要生存,要发展,要发达,就必须同其他国家、其他民族进行广泛的、全面的合作。

事实上,在广泛的、全面的国际合作中,每一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一定会得到益处。因为,通过这种合作,相关国家就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在资源配置和技术发展等方面的优势,避免劣势,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本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最大限度地提升本国人民群众的整体生活水平。而在世界经济相对低迷、贸易保护主义强势抬头之际,我国的“一带一路”工程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占世界人口 60% 以上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了这样一个广泛参与国际合作的机会。这自然会得到相关国家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从而变成了一项名副其实的民心工程。

很显然,除了合作对象的外部支持,“一带一路”规划在我国内部受到的重视和欢迎程度更是给这项规划的开展注入了强大的社会推动力。因为“一带一路”不仅会直接促进项目沿线地区,如甘肃、青海、新疆地区的经济发展,更会带动中国整体行业的升级,而这种地区和产业上的发展机遇一旦落地就是巨大的惠民工程或利民政策,这样利好百姓的倡议自然受到人们的广泛支持。而只要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有什么事业不能成功?

当然,或许有人会说,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曾经轰轰烈烈,它不也一度销声匿迹了吗?曾经红极一时、被看作权力、财富、社会地位象征的丝绸现在不是已经无人问津了吗?在几百年前,人们对我们现在几乎须臾不可离开的石化能源不是还一无所知吗?再过上一段时间,它是否也会退出历史舞台呢?

上述问题显然不是杞人忧天,更不是骇人听闻。用我们中国那句俗话来说叫作“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更何况,石化能源问题并不是一个远虑的问题,而是一个已经威胁到人类生存的、紧迫的现实问题。众所周知,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各种极端天气、雾霾等等,所有这些都与石化能源的大规模使用有直接的联系。为了应对这一问题,有 189 个国家参加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组织经过艰苦的谈判,已经达成了著名的《巴黎协议》,对 2020 年以后世界各国的碳排放做出了安排。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宣布美国将退出《巴黎协定》,但此举在国际社会和美国国内所遭受的批评和指责、所引起的强烈反响,足以说明这个问题有多么重要。

碳排放和空气污染的确是人类已经陷入的一个严重困境,但却不是最严重的挑战。人类所面临的最严重挑战是:我们目前所严重依赖的石化资源正在耗尽、正在枯竭。按照目前的探测速度和开采速度,地球上的石油资源还能维持43年,天然气可以维持63年,效率最低、污染最严重的煤最多也只能维持200年。也就是说,如果再不想办法、不采取措施,人类将很快陷入没有能源可用的绝境。

避免绝境的办法是寻找新的能源,特别是那些可再生的、清洁的能源,如太阳能、风能、水能、原子能等等。这些能源不仅污染程度低,而且储量丰富,有些甚至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但问题是这些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分布不仅不均衡,而且还无法直接转移。当然,我们可以把太阳能、风能、水能等先转变成电能,然后再输送到其他地区,然而,按照传统的输送方式,很大一部分能源将消耗在输送途中。因此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只能一方面既担心污染,又担心石化能源枯竭,同时又眼睁睁地看着大批大批的清洁资源被浪费掉。

由于中国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们的艰苦努力,人类终于找到了问题的解决办法:特高压输电。特高压输电不仅大大降低了输送途中的损耗,还使得输送距离有了革命性的加大。这就使得大量的清洁能源有了广阔的用武之地。如果我们再推进一步,全面推广特高压输电技术,那就有可能把全球的供电系统连接成一个网络,我们人类就将彻底摆脱目前在能源问题上污染和短缺并存的困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2015 年 9 月 28 日的联合国大会上,郑重地向全世界宣告:中国要在不久的将来,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这无疑是全人类的福音。而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和全球能源互联网的构建也是“一带一路”工程中的重要内容,这自然就使得这一工程更容易得到相关国家、甚至全世界人民的广泛支持。

四、结 论

我们中华民族一贯倡导:世界各国人民应该形成一个命运共同体。我们不但自己向往、追求富强,也希望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人民也过上美好的生活。因为我们中国人民始终相信:只有大家好才是真的好,任何单方面获益的合作和交易都不可能长久。我们的“一带一路”工程之所以吸引了那么多的合作者,除了顺应了天时、占据了地利、聚集了人和之外,显然是因为它将惠及所有的合作方。作为一个开放式的项目,“一带一路”真诚地欢迎所有的合作者。作为“一带一路”工程最重要的资金提供者和保障者,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银行已经拥有了 77 个成员国,拥有了 1000 多亿美元的资产,此外,中国政府还出资 400 亿美元设立专门丝绸基金。天时、地利、人和,再加上这些具体的措施,相信“一带一路”工程一定会取得圆满成功。

参考文献:

- [1]孟子·公孙丑下[Z]
- [2]孙臆兵法·月战[Z]
- [3]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statist_e/wts2017_e/wts17_toc_e.htm.
- [4]丁阳.“一带一路”战略中的产业合作问题研究[D].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
- [5]弗兰科·潘.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封底.
- [6]恩格斯,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45.
- [7]弗兰科·潘.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429.



刘玉安，男，1953年1月出生于山东省威海市，法学博士，现任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73年入伍服役，1977年考入山东大学哲学系，1984年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994年在职完成博士学业后继续任教。自1988年开始，受教育部委派和对方邀请，先后到丹麦、瑞典、英国、荷兰、美国等国留学和做访问学者，1996年破格晋升为教授，1997年被遴选为博士生导师，2000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1996-2007年间任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2006-2010年间任教育部政治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2009年和2014年分别被聘为第六届、第七届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政治学组）成员。

多年来一直集中于欧洲政治特别是欧洲社会政策、欧洲社会民主主义问题研究。先后主持并完成了“国家发展中的公平与效率”“21世纪欧洲社会民主党及其转型”两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北欧福利国家研究”“国外社会民主主义研究”“九十年代以来西欧社会民主党社会政策改革研究”“21世纪的西欧社会民主党”四个教育部基地重点和重大项目以及国家电网公开招标的全球能源互联网建设中的风险机制研究等项目；用中英文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经济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福利国家与社会和谐》《Will the Scandinavian Model Collapse》《国际环境与北欧模式》《法国的社会改革：前进还是后退》《西欧福利国家制度的危机及其改革》等论文40余篇，在人民出版社、山东人民出版社、山东大学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出版《从民主社会主义到社会民主主义》《告别福利国家》《北欧福利国家剖析》等著作10余部。